



通向大国之路的
中国政治

大国策

为中国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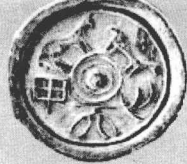
为国是谋

大外交

主 编 唐 晋
执行主编 谈火生 袁贺

人民日报出版社

大国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强国之鉴 在止于至善



通向大国之路的
中国政治

大国策

为中国策

为国是谋

大外交

主 编 唐 晋
执行主编 谈火生 袁贺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政治 大外交/唐晋主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 - 7 - 80208 - 851 - 1

I. 大… II. 唐… III. ①政治 - 中国 - 文集②对外政策 - 中国 - 文集
IV. D6 - 53 D82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6252 号

书 名：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政治 大外交

出版人：董 伟

主 编：唐 晋

责任编辑：林 海 蒋菊平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010) 65369538 65369514

网 址：[www. peopledaily. com](http://www.peopledaily.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开 本：16

字 数：290 千字

印 张：17. 75

印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208 - 851 - 1

定 价：49. 80 元

法治成就大国

——《大国策》系列丛书导言

高全喜

《大国策》丛书，旨在为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读者提供一份思想的盛宴，为治国理政者提供一份决策参考。丛书共四十多册，荟萃学者五六百人，其主题集中于大国之路和强国之鉴。我曾经主编《大国》学术丛刊，对于现代国家的法政建设有自己办刊的思考，今受嘱谈点感想，权且作为导言。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大国，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我们的自然禀赋、人口规模、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人文风情，等等，都注定了我国是一个大国。但是，大国不等于强国，更不等于优良的法治之国。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如何从内政上厘清一个大国与强国之间的本质性不同，在外交上构建一种国与国之间的责任关系，需要我们有一双“法眼”。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同于古代，古代王朝政治的国家治理经验，例如被某些学者所褒扬的“德治”、“峻法”，以及“朝贡体系”，等等，在当今世界，已经失去了原初的功能和效用，现代社会迫使我们建设一个新型的国家，即法治国。一个社会犹如一个活的生命体，法治是其中的骨骼和精髓，其他的所谓国之“大”者，不过是一堆肉泥而已。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治，尤其是正义的法律之治，它的国土再大，人口再多，资源再丰，历史有多辉煌，文化有多灿烂，人民有多勤劳，这一切的一切，不

过是人家或列强口中的尤物。

中国的近现代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寻求法治国的挫折史。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这个老大的帝国逐步崩溃了,但如何重新建设一个共和国,却是歧路复歧路。我们有康梁变法、孙中山革命、“五四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对于“德先生”、“赛先生”的呼吁,有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梦想,直到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我认为,强国梦的关键在于法治,只有法治国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大国,一个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强国。

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有凝聚力,有支撑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从人类历史的经验来看,凡是真正的持续强大的国家,而不是消耗型的短暂的所谓一时之强国,必定是一个法治国,法治不但可以维护和保障一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树立国家的权威,而且可以使人民自由和幸福。法治与自由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只有法律才能防范他人或政府的恣意侵犯,为人民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提供规则与秩序。法治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基础,凡是法治优良的国家,人民追求财富的合法欲望不会受到压抑,私人财产受到严格保护,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在有效法律的调节之下健康而有序地发育和成长,经济和贸易必定繁荣兴旺,充满活力。

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一个政治上专制的国家,但只要它的法律制度是独立的、公正的和有权威的,也仍然可能成为一个强国,例如英国和法国的有限君主专制时期就是如此。当然,如果能够继承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那么,一个自然禀赋上具备了大国条件的国家,就必定是一个强国,而且是一个自由的强国,人民在这样的国家里充分享受了作为大国国民的自由、福祉和荣耀。因此,他们发自内心地把这个国家视为自己的祖国,可以奋不顾身地为自己的祖国牺牲,这就是哈贝马斯等人所说的“宪法爱国主义”,或公民爱国主义。其实,这种爱国主义可

以追溯到古代罗马共和国,正像西塞罗所指出的,罗马人民对于国家的热爱,与其说是对于它的国土,不如说是对于它的法律,对于共和国的政体制度。这种宪法爱国主义与近代日耳曼国家的基于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是大不相同的。

今天在中国的语境下重新思考建设自己的强大的国家,我认为,法治国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更具有本质性的积极意义。在近二百年的中国近代历史中,我们的国家建设屡屡受挫,虽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法治不彰显然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要说,我们不缺乏奋斗的勇气、革命的精神和爱国的激情,也不缺乏建国方略、五年纲要和十年规划之类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针政策,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少有法治主义的保守和审慎精神,少有法治国的恒久的建设目标。

因此,建设一个法治国便成为首要的国家主题。法治昌明,政体稳定,人民才有追求财富的欲望和恒心,国家的税收才源源不断,公民美德才得以光大。对此,休谟曾经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在所有杰出的留有难忘成就的人物中,首要荣誉看来应属于立法者和国家缔造者,因为他们为保障后代的安宁、幸福和自由,留下了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

在当今国际社会,人们经常谈到大国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是大国或超级大国对于今日世界的基本承诺。随着中国的崛起,把中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大国,并要求其承担必要的大国责任,这似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致吁求。

我们看到,无论是从内政还是从外交来说,国家责任都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中心课题,而这一切又都必须依靠法治,法治国是实现国家责任的基础。在国内政治领域,作为国家的治理者和领导者,它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有责任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有义务维护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平与安宁,有责任和义务惩治腐败,建立廉洁、高效的法治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关于中国威

胁的论调甚嚣尘上，对此，我们虽然提出了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的方略，但国际社会的担心并没有太大的改观。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关键是法治还没有落实到位，也就是说，由于怀疑我们还不是一个法治国，所以对于我们的承诺，国际社会还大多视为政治上的修辞。

其实，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对于我们不仅具有内政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在当今世界，所谓大国责任，最基本的是意味着法律上的责任，即一个国家在法律制度上要承担的国际责任。它首先要求的是一个法治政府的存在，一个遵循法治的国家，才可能是负责任的，否则无论如何表白，都具有权宜之计的性质。因此，和平发展也好，和平崛起也罢，关键在于要切实地建设一个法治国家。就近代世界历史来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两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开战的事件，所以，所谓民主和平论就成为了当今和平论的一个主流理论。无论从近期的国家事务还是长远的民族未来来看，世界和平对于中国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把法治国的建设置入国际环境的大背景来考虑。

当然，中国在国际事务做负责任的大国，并不意味着要与美国一致，也不意味着非要与美国对抗。关键在于要做一个具有独立主体意识的国家，而这个国家意识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一己之私，而是国家利益，是法治下的国家人格，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我们要警惕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民粹主义的极端情绪，另一种是极端的亲美主义。在我看来，这两种态度都是盲目的、幼稚和非理性的。政治是一种审慎的技艺，需要政治上的实践理性和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国坚定不移地走法治国家的建设道路，我们就有可能建立国家的自主性，从贫弱的大国走向富强的大国，走向对内对外都负责任的自由的大国。

目录

CONTENTS

法治成就大国

- 《大国策》系列丛书导言 高全喜 / 001

外交姿态的演变

自 1971 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中国的主权国家身份问题已得到解决,从此进入多边外交阶段。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为“多边外交”的第一阶段,但外交姿态仍然非常谨慎和低调;2001 年加入 WTO 之前为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参与式外交,中国开始注重国际形象;加入 WTO 之后为第三阶段,外交姿态开始变得主动和积极,上海合作组织、朝核六方会谈、海外维和、索马里海域护航等,中国逐渐由权利享受者发展成为责任的承担者。

- 中国外交 30 年:对进步与不足的若干思考 王逸舟 / 002

发现中国新外交

- 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 苏长和 / 021
- “中国责任论”考验和平发展 刘建飞 / 031
- 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 王存刚 王瑞领 / 040

霸权不是一个好东西

美国不喜欢跟中国打交道，因为它把中国看作是体制上的异类。美国又不得不跟中国打交道，因为没有中国，美国在许多问题上绕不过去，比如说反恐、朝核问题。两个最难打交道的国家，又必须打交道，这就是中美关系。美国推行的霸权政策当然不是一个好东西，但如果美国衰落了，我们的纺织品、玩具、电器在国际市场上就会少一块倾销地。从某些角度看，我们需要美国。

- 中国对美战略的历史演变与未来趋势 楚树龙 柴璐 / 055
- 中美关系基本透视和战略分析 时殷弘 / 064
- 中美外交“误解”何在 王缉思 / 071
- 中国经济崛起和中美经贸关系：美国国会的认知与反应
..... 孙哲 刘建华 / 079
- 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 王缉思 徐辉 / 092

中国的“经济崛起”与日本的“政治崛起”

中日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复杂的大国关系之一。亚洲目前的外交现实是，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日本的“政治崛起”正在同时发生。这两种崛起，不可避免地引起双方的猜疑，甚至是敌意。日本为了谋求“政治大国”地位，采取了“联美抑中”战略，也正是这一战略，造成两国间的认同对立，并形成中日关系改善的巨大障碍。

- 从大历史观看地缘政治 叶自成 / 115
- 从海陆二分到海陆统筹
——对中国海陆关系的再审视 李义虎 / 126

权力变更、认同对立与战略选择

- 中日关系的战略未来 朱 锋 / 139
- 中日东海争端及其解决的前景 朱凤岚 / 156
- ### 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
- 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 秦亚青 魏玲 / 175
- 中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与东北亚政治结构 金强一 / 192
- ### 中国的外交斡旋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
- 为什么外交解决朝核问题这么难? 朱 锋 / 204
- 中国的南亚外交与克什米尔问题 张 力 / 215

因能源而外交

因为能源太重要,便有了“能源外交”一词。中国外向型能源开发,选准了五个方向:一是中东方向,中国进口原油中几乎60%来自中东;二是非洲方向,重点是苏丹及非洲西海岸国家;三是拉美方向,重点是委内瑞拉;四是南向,比如印尼和澳大利亚;五是北向,比如中亚和西伯利亚。要把这五个方向的能源通道完全打开,将伴随着国家在外交资源上的巨大投入和地缘战略斡旋。

- “非传统安全”解析 朱 锋 / 227
- 中国与非传统安全 王逸舟 / 240
- ###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政治外交效应
- 黄 晶 / 249
- 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国际政治课题 查道炯 / 258

外交姿态的演变

自 1971 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中国的主权国家身份问题已得到解决,从此进入多边外交阶段。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为“多边外交”的第一阶段,但外交姿态仍然非常谨慎和低调;2001 年加入 WTO 之前为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参与式外交,中国开始注重国际形象;加入 WTO 之后为第三阶段,外交姿态开始变得主动和积极,上海合作组织、朝核六方会谈、海外维和、索马里海域护航等,中国逐渐由权利享受者发展成为责任的承担者。

中国外交 30 年：对进步与 不足的若干思考

王逸舟

自 1978 年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在过去的 30 年,中国日益成为当代世界事务的重大参与者、建设者和负责任者,国际关系发生的重大进步多少来自中国的新贡献,国际环境的变迁同样影响到中国的发展。在外交领域,中国正在出现静悄悄的转型与革命,其内容和演进的方向与全球进步的潮流是一致的,即: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对军事力量的使用更加慎重,越来越看重全球市场和贸易等提升国力的经济因素;强调“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与国内大力强调民生的态势相一致,越来越注意对中国公民海外权益的保护;强调“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的重要性,重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协调过程,越来越积极地介入各种国际组织和法律的制订和执行过程;在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之必要性的同时,自身也更加注重外交学习与制度创新,越来越认真地在国内推进外交决策民主化(特别是大众参与的进程)。虽然这些动向尚处于“进行时态”,说明中国外交转型无疑已进入新的长征征程。思考和总结这些进步,对于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均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能够见到的一点是,在这 30 年里,中国人对国际安全环境有了越来越积极乐观的认知,此前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焦虑心理和造反意识,逐渐被更加自信、开放与合作的态度所替代。旧中国是谈不上得到国际承认的大国外交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形态制约了中国在国际舞

台的角色、“东亚病夫”的形象提示了内忧外患煎熬下的困境。新中国建立之后,从根本上改变了列强支配和凌辱中国人的局面,一盘散沙的旧中国代之以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这时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外交。然而,建国以后在不同阶段上由于国内外因素的不同影响,中国外交的主题和立场是不一样的。新中国早期的中国外交适合了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特点。一方面是向老大哥苏联学习和政策上的“一边倒”,另一方面竭力保持自主性,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革命”与反霸的弦始终绷得很紧。1978年是一个新的起点:从邓小平始,最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的世界观发生了截然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变化,离“战争与革命”的意识及“造反者”的形象越来越远,而与当代多数国家的追求及认同逐渐接近。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指出“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与极“左”年代的思维拉开了距离,为改革开放事业的启动奠定基础;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更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和观察世界大势的出发点。在《2006年中国国防白皮书》里,对此就有权威而系统的阐述。例如,白皮书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的基本态势进一步发展,世界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它强调:“世界格局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重要时期,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局面有望改善;各主要力量既相互牵制和竞争,又相互协调、彼此借重和务实合作。一些发展中大国和区域集团实力增强,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上升;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分工体系深刻变动,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生机勃勃,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利益关系逐步加深。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不断增多,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深入发展。各国更加重视通过国际协调合作和多边机制解决发展和安全问题。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维护和加强。世界大战和大国全面对抗在较长时期内可以避免。”它指出:在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保持基本稳定。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平等、多元、开放、互利的地区合作局面正在形成,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逐步深化”;“中国的安全环境总体有利”。针对外界对中国国防费用增长的批评和担忧,这本相当于中国党和政府对外重大宣示的文本解释道:“这种增长仍属于

弥补国防基础薄弱的补偿性增长,是与国家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适度增长。20世纪80年代,国家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强调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展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增信释疑、携手共进的基本态度。显然,作为当代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和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前景,相对于一些国家而言,持有更加乐观看好的态度。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对国际时事非常关心,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政府现有立场的社会基础,体现了近几十年的持续和平发展培养比来的大众心理。21世纪初中国人的世界观,已远离了20世纪50年代或“文革”的一代人。

其次,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以来,中国更加乐意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其作为国际成员的意识得到明显增强。试以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为例:在这本对外公布的中国国防事业报告中,列举了一系列重要举措,说明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它指出:中国“认真履行《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所附经修订的《地雷议定书》的相关义务。人民解放军积极开展履约宣传教育,落实议定书相关技术要求,已对不符合规定的杀伤人员地雷进行全面普查”;“坚决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支持联合国在防扩散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参加了防扩散领域的所有国际条约和相关国际组织,建立了涵盖核、生物、化学、导弹等相关敏感物项和技术及所有军品的完备的出口管制法规体系,实行严格的出口审批程序,确保有效管控”;“1990年以来,中国已参加16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共派出维和军事人员5915人次”,“2000年以来,中国向7个任务区派遣维和警察893人次”。假使观察中国在其他领域开展的国际合作,如国际金融合作、国际商务合作与国际能源合作,情况会更加显著。不难察觉,通过最近几十年的栽培和熏陶,在中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在中国公众和舆论那里,“国际社会”观念正在逐渐形成和获得重视,拥有了更大的合法性和道义权威:它不只是引导中国外交官行动的要素之一,也越来越多地内化为普通百姓判别政府外交政策成败的一把尺度。还应看到,在近些年中国对外政策实践中,与“和谐世界”指导性理念相关的一系列新方针新提法,通过和平合作、共同发展、文明对话等内容,增强了

中国人和中国外交的国际共同体成员意识:1997年前后,中国在与东盟对话过程中,提出“新安全观”思想,包含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等内容;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正式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倡议;同年12月6日,温家宝在法国发表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演讲,提出推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理解和交流的倡议;在与邻国关系方面,中国领导人最近几年多次重申“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致力于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把它作为合作共赢的新发展观;在前述中国政府第五本国防白皮书里,不仅多次提到“国际社会”的概念,而且强调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强调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稳定的坚定力量。总之,从中国主要领导人在外的主要政策性演讲以及国内媒体和公众关于这些政策方针的理解评判等方面观察,我们可以清晰地见到当代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国际责任意识。不管中国对国际承诺的大小怎样、进展如何,也无论关于这种承诺存在哪些内部争论,中国人的合作意愿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现在的外交领导人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方针,社会和公民个人日益成为国家外事服务的中心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几十年间,对外关系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比较识大体、看大事、讲大局,但不太重微观、不太看小事、不太讲个人。尤其很少把公民个体的需要放到重心和焦点位置。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比如,在毛泽东时代,外交工作特别看重大国关系(先是苏联、后是美国),重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强调军事斗争的优先性(“文革”时一个流行的动员口号是,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追求“解放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的世界革命目标,要求所有人(无论干部、军人或普通百姓)有义无反顾为之献身的思想准备;中国那一时期的对外经济和其他援助,例如对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援建项目,基本上是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自豪于国际责任义务的同时,疏于考虑投入回收和等价交换的问题,更不必谈评估其对中国国计民生的潜在消极影响。显然,它与国内当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氛围不无关系。改革开放之后,上述局面逐渐得到扭转,在市场化不断推进的新环境里,

“言利”不再是可耻害羞的事情,相反成了正当的权益表达,成为国内建设和对外交往的重要考量标准;与之相应,拥有产权和法人地位的企业和自主意识、权利意识得到增进的公民,都在国家新的外交方位里获得利益的代言及合法的追求。无论如何,经济重心的形成是毋庸置疑的。从外交领域分析,这种转向使得新时期中国的外交家们更加注重百姓的实际利益和需要,比如说,更加看重“黄油”而不是“大炮”,努力学会招商引资、带动国人和货物“走出去”等新手段,同时加大领事保护力度,密切关注中国公民个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稍微浏览一下中国外交部网站就会发现,有关“领事保护”、“领事新闻”、“领事知识”、“领事论证公证”、“侨务工作”、“公民出国注意事项”及“特别提醒”等内容,占据了不断更新的界面之相当大的空间,它揭示出一个和平崛起的经济大国的动态。中国公民的出国人数急剧增长,出国人员也由过去主要是外交官、政府官员和其他公干者,变成了包括了与日俱增的出国旅游者、劳务队伍、海外学子、海外移民、各种商务考察团以及负有维和使命的中国军人的庞大队伍。在最近几年,随着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等“新政口号”的逐步落实,中国政府的外交风格变得更加务实和注重人性,更加关切普通百姓的生计与愿望,更加适合日益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比如,外交部门在保持国家形象和礼宾外交最低必要性的同时,大力削减了国事出访和接待方面的繁文缛节;外交部政策研究司等的主要负责人多次上外交部网站回答中国网民的提问,使这个建立不过几年的网站成为中国政府各部委里点击率最高的网站之一;在前部长李肇星的提议下,外交部新闻司专门设立了“公众外交处”,定期举办“公众开放日”,邀请各界民众代表参观外交部并与部司领导见面。新任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会见公众代表时特别强调:“外交为民就是外交为人民服务,这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外交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第二,人民是外交的基石和后盾。”如同“公众外交处”一位官员感慨的那样:“外交部近年来在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外交部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有了公众外交的意识,在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意识也在深入人心。”

讨论至此,已涉及中国外交转型的最重要内涵之一,即社会的参与逐

渐增多,外交决策过程朝着民主化、科学化的方向推进。从建国初期的军人大使到现在的职业外交家,从捍卫新中国的主权尊严到保障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同主轴,从神情严肃、给人以许多神秘感的活动方式到更加开放自信、国事安排与公众外交并重——在不同代际中国外交人的身上,可以感受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经济发展也最神速的这个大国,从革命时期向平时时期、从“英雄年代”向“平民年代”、从“苏联模式”向“国际接轨”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是在大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不知不觉实现的,近几年在新一代领导人的引导下,更朝着精致有气质、高级和负责、独立又开通的外交大国方向过渡,展示着静悄悄却富成效的中国外交革命历史画卷。其中最重要的引导因素,是不断增多、增强的社会性参与和部门间制衡造成的外交决策民主化进程。所谓“社会性参与”,首先包括公众开放日的定期化(始于2003年9月、到2006年底已有10次),对社会各界开放阅读的部分外交解密档案(涉及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对外关系),建立“外交部公众信息网”并每月公布“访问量排名”、“最受欢迎新闻”、“网站访问者来源”以及外交部网站主站和各使领馆分网站的情况;其次还有专家咨询活动的机制化和经常化,把它作为外交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步骤。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国际问题研究人员,我亲身感受到最近几年外交部向专家咨询活动的增多。据我有限的了解,这种咨询大体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咨询对象主要是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国防问题专家和经贸问题专家。基本上,每遇重大外交危机和国际挑战的紧要关头,乃至每年初外交部各司委规划全年重要安排,以及主要领导人出访重要对象国和国际会议的前夕,都会有不同形式的座谈会、课题布置和咨询活动;成果形态也多种多样(包括简报、讨论纪要、专题报告),成为各司处直到部领导和更高层决策者的参考意见。譬如说,学者关于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发展的意见、关于东亚经济合作及中国参与方式的意见,还有一些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建议,都受到外交决策部门的重视。虽然目前尚谈不上已经建立系统完备和成熟的咨询机制,我也常常听到“与美国相比中国这方面如何需要改进”的批评或建议,但总体上的进展和成效是